

革命家與啓蒙者的雙重身分 ——五四時期的安徽知識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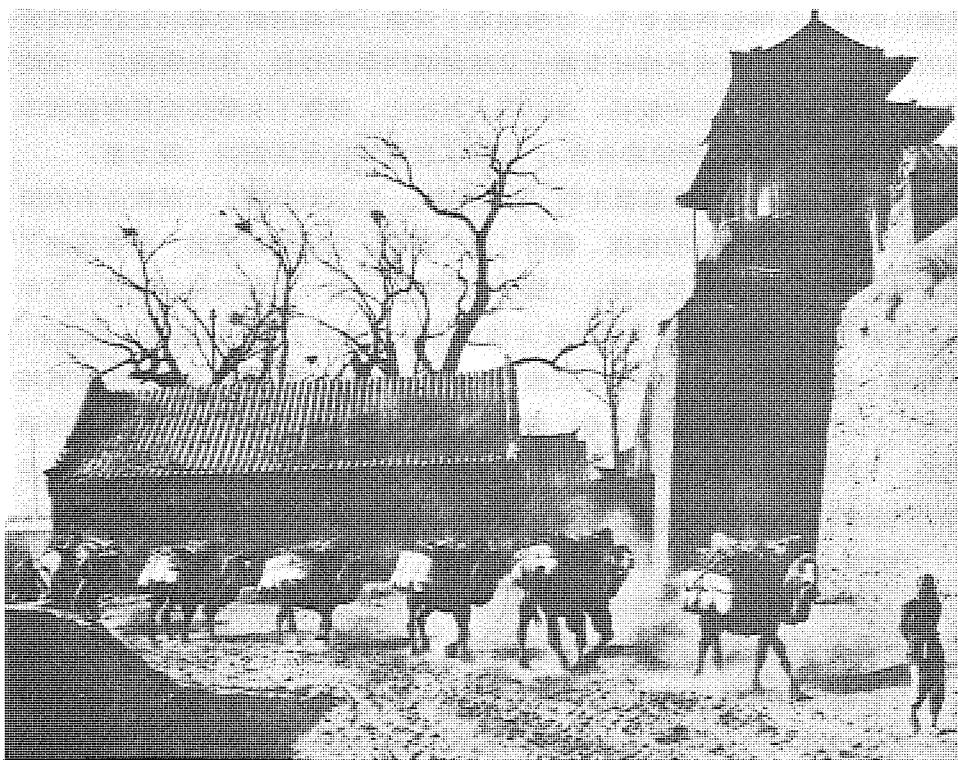
•陳萬雄

至今五四運動史仍是中國近代史中的一門顯學，著作繁富，立論紛紜。雖然如此，筆者以為關於該運動的研究，存在兩項的不足。首先，由於長期的因素，慣於將五四運動及前此的辛亥革命運動截然劃分為兩個歷史時期，忽略兩者之間的綜合考察，以致在歷史理解上出現不少枘鑿不通、迷濛不清的地方^①。其次，對五四運動尤其是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時至今日，仍然集中於若干主要人物思想的討論，甚至以之去建立理論架構，容易流於從觀念到觀念，由理論到理論，而忽略從廣深處去挖掘史實以彰顯運動的實貌。

舉例來說，學術界對五四愛國示威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兩者間的關係，理解上相當模糊^②。另外，關於如何詮釋新文化運動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歷史意義，亦存在相當大的歧異，這種歧異集中表現在對救亡與啟蒙關係不同詮釋上的糾纏^③。這種理解的模糊與詮釋的歧異，往往由於史實挖掘不够詳明所致。

本文不從理論分析入手，而試圖以近代知識分子為線索，對安徽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作綜合的個案考察，透過史事，以彰顯五四運動的性質，也試圖以之對五四運動的政治和文化關係，政治和文化上的歷史意義，提出些個人的看法。

筆者考察所得，安徽的五四運動，無論是愛國政治運動或新文化運動，有一股指導和倡導力量予以積極的推動和領導。他們是近代中國正式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第一代近代型知識分子。二十世紀初，這股力量一經形成，就成為推動政治社會革新運動的主要力量。他們既是清末民初的革命運動力量的組成部分，在其後的五四運動中，他們再次充當了運動的倡導者和指導者的角色。安徽這股力量是二十世紀最初二十年最活躍的一股歷史力量，其背景和當時的歷史作用，與筆者分析以《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的指導力量的性質並無二致^④。



— 運動的發軔

安徽在五四運動中，雖被認為是「全國最活躍的地區之一」^⑤，可惜在全面討論五四運動著作中，都不如一些省份，設專章介紹^⑥。

由於在北京的新文化運動指導者如陳獨秀、高一涵等人的聯繫，北京5月4日學生示威事件消息很快傳到安徽。安徽五四運動最活躍地區是安慶、蕪湖和六安等地區。值得注意的是，安徽五四運動明顯是由一些教育界人物和教育機構在推動。

在安慶，各校代表在5月6日在安徽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召開會議，除學生外，還有朱蘊山等人參與^⑦。

在蕪湖，首先活動起來的是省立第五中學，並派代表主動聯繫各校。該校修身教員劉希平和校監高語罕支持學生的行動，並代為策劃。經聯繫，蕪湖以五中、萃文和二農三校學生為首，在7日遊行示威^⑧。5月10日蕪湖各校派代表召開聯席會議，會議則由高語罕和劉希平主持。會議議決成立「蕪湖學生聯合會」和「蕪湖教職員聯合會」，後者由劉希平擔任會長。該兩會的成立，成為推動安徽五四運動的主要組織。5月12日，蕪湖各界代表和各校教職員開會，通電政府和「歐事會」，力爭山東交涉。電稿由高語罕擬定，王蕭山宣讀。在五四運動推動上，教育界的光昇、洪子翊、周松圃、李光炯、史大化、朱希文、蔡曉舟、宋竹蓀等發揮了指導作用。

遊行示威活動過後，安徽繼續進行各種運動，如抵制日貨，組織街頭宣傳隊等。其中教育改革衝擊了軍閥倪嗣沖對教育機關和學校的操縱，影響不小。

遊行示威活動過後，安徽繼續進行各種運動，如抵制日貨，組織街頭宣傳隊等。其中教育改革衝擊了軍閥倪嗣沖對教育機關和學校的操縱，影響不小。

最矚目的應是在師生的抗爭下，分別促成了安徽三所最重要中等以上的學校校長的撤換，並分別由光昇擔任安徽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李光燭擔任一師校長，而由劉希平擔任五中校長，並以三人為核心，聯繫了女職校校長李寅恭等組織了「安徽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形成了教育界抗衡軍閥的一股力量。

1921年6月2日，在安徽發生的「六二慘案」，是五四時期一全國較著名事件。該事件激發了全省的罷課、罷市、罷工運動。該運動的推進，教育界起了指導性的作用。法政校長光昇、一師女校校長徐音浦、一師校長李光燭、五中校長劉希平、三農校長沈子修以及其他教育界人士洪子翊、周松圃、高語罕、盧仲農、王蕭山等人發起組織了安徽六二慘案後援會。到慘案主角學生意高崎不治，又組織了姜案訴訟委員會。時北京大學畢業生安徽一中校長楊亮功即回憶說：「以省教育會為神經中樞，多由光明甫（光昇）、李光燭、孫養燭、孫希文、周松圃及洪某主持其事，蕪湖教育界劉希平、高語罕亦參加策劃。」^⑨

1921年秋，工會、律師公會、報業公會、西醫學會、法政學會等組織了「安徽省澄清選舉團」，該團也就以李光燭、光昇、劉希平諸人為骨幹。

對省內各次運動，皖省旅外的文教界人士如陳獨秀、王星拱、高一涵、李辛白、常恆芳等一直積極支援。1919年驅逐三位保守校長，皖省旅外文教人士則派張鴻鼎等回皖活動。1920年8月，北京大學安徽籍教職員高一涵、程演生、蔡曉舟等十七人發起了「旅京皖事改進會」；約略同時，陳獨秀等十五位旅滬安徽人士組織了「旅滬皖事改進會」，不斷聲援皖省運動並予以指導。

作為五四運動另一方面的文化革新運動，在安徽也相當活躍。

1915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在安慶、蕪湖廣泛的流通，影響不小。

蕪湖被認為是「安徽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蕪湖當時有六個中等學校，即萃文、聖雅各、省立五中、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省立第二女子師範等。其中省立第五中被譽為「蕪湖北大」^⑩。運動中的活躍人士朱蘊山曾說：「安徽的新文化運動，實際是從蕪湖第五中學開始的。」^⑪該校學生被認為在文化革新的認識以至對內外局勢和社會情狀的分析上，能力較強。該校形成這種氣氛，該校老師尤其是劉希平和高語罕等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兩人努力向學生介紹新思想，宣傳民主科學的觀念。五四運動的活躍領導分子蔣光慈、李宗鄴二人就直接受劉、高二人的啟牖^⑫。1918年，省立五中有個無政府的秘密組織，並編印了《自由之花》的油印小報，高語罕就是這個組織和刊物的積極支持者。當時親身參與運動的學生胡蘇明日後回憶，認為蕪湖的學生運動的基本力量「就其組織基礎來說，則以二農，五中為支柱。」^⑬五中已如上述，當時任教於二農的盧仲農、王蕭山、陳唐卿等對該校學生有較大的影響^⑭。

學校而外，皖省五四時期傳播新文化運動，以蕪湖的《皖江日報》為重要陣地，《皖江日報》副刊《皖江新潮》主編郝大顛（耕仁）曾任教於二農和二女師，他被認為是蕪湖新文化拓荒者之一。高語罕、蔣光慈、王蕭山和錢杏邨等人都是該報宣傳新文化的主力^⑮。

五四前後，科學圖書社是蕪湖唯一的一家經營全國各地新書和雜誌的場

五四運動另一方面
的文化革新運動，在安徽也相當活躍。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在安慶、蕪湖廣泛的流通，蕪湖被認為是「安徽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所，在新文化傳播上起了不少作用。運動期間，蕪湖科學圖書社乃成為領導蕪湖以至全省學生運動的人士經常聚會的地方。光昇、李光燭、沈子修、劉希平、盧仲農、高語罕、李克農等人就常在這裏開會，以決定運動的大事。蕪湖聲援安慶「六二慘案」運動，反對曹錕賄選運動以至全市人力車大罷工等事件，都是在這裏決定的^⑯。五四時蕪湖商界所以罷市，關鍵人物也就是科學圖書社的職工^⑰。

五四後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管理員的蔡曉舟辭職返抵安慶開辦書店。蔡氏經常將《湘江評論》、《錢江評論》等著名宣揚新文化的書刊贈送給學生。他並創辦了《黎明》、《周報》和《安徽學生》等刊物，以推動新文化運動^⑱。蔡氏在五四前已積極提倡白話文，並著有《白話文作法》一書。雖欠缺直接憑據，筆者頗懷疑蔡氏之由北大返回安慶，是經着意安排而負有推動皖省新文化運動之責的。

五四後，安徽新創辦以推動新文化為職志的刊物甚夥。除蔡曉舟創刊的幾份外，1920年朱蘊山、宋竹蓀等在安慶創辦了《平議報》，旅滬皖人創辦了《新安徽》，安徽省學聯創辦了《安徽學生會周刊》，此外蕪湖地區另有《蕪湖半月刊》、《蕪湖學生會簡刊》等。

五四後，社會辦學風氣也甚盛。其中較著名的有以劉希平、高語罕、朱子帆為首辦的商人夜校和工讀學校，五中學生分會主辦平民夜校，以李光燭、劉希平、盧仲農、朱蘊山為首創辦了公立職業學校等^⑲。

二 運動的指導力量

五四運動乃是以學界為先驅和主體的運動，運動的前期尤然，安徽自不例外。在安徽整個運動中，一股知識教育界的力量，起了指導性的作用。

毫無疑問，整體來說，五四運動乃是以學界為先驅和主體的運動，運動的前期尤然，安徽自不例外。上文粗略勾勒五四運動在安徽的梗概，旨在彰顯在安徽整個運動中，一股知識教育界的力量，起了指導性的作用。其中較活躍的人士有李光燭、光昇、高語罕、劉希平、盧仲農、朱蘊山、史大化、沈子修、桂月峰、汪孟鄒、蔡曉舟、周松圃、王蕭山、洪子翊、孫養癉、張鴻鼎、陳唐卿、李寅恭、徐音浦等人。關於這些人物的教育和政治活動的背景，表引如下頁^⑳。

至於其他人，因暫缺資料，無法詳列。僅知李寅恭在1909年與章士釗、楊昌濟同船赴英國留學。常恆芳畢業於安徽蕪湖公學，後留學日本，他並且是安徽最早的革命團體岳王會創辦人之一。蔡曉舟曾參加熊成基的安慶起義。其他如孫養癉、王蕭山、張鴻鼎、史大化等在清末民初是安徽相當重要革命黨人。

根據上述諸人簡單背景介紹，首先我們注意到，這股皖省五四運動指導力量的成員，大體出生於十九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早年接受的是嚴格的傳統教育，諳熟中國古典學問，不少更擁有傳統的科名。二十歲前後或早些，他們開始接受近代新式的教育，可以說是安徽在廢科舉前後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人。不少更曾留學外國，主要是到日本。總的來說，他們是安徽最早由傳統教

姓名	教育背景	重要政治和社會教育活動
李光燭 (1870-1941) 字德膏	光緒年間舉人、後棄科舉到保定蓮池書院從吳汝綸學。1902年隨吳汝綸赴日本考察教育。	1902年協助吳汝綸創辦桐城中學。 1903年與盧仲農創辦安徽旅湘公學，次年遷回蕪湖，易名安徽公學，該校成了安徽革命活動的發源地。 李氏曾加入秘密暗殺團體。晚清孫毓筠等人謀刺江督端方，徐錫麟等人之謀刺皖撫恩銘，熊成基之在安慶起義，暗中推動者李氏出力甚多。武昌起義後，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
桂月峰 (1872-1932) 原名月釗	秀才。 兩江優級師範學堂畢業。赴日本東京宏文書院就讀。	曾加入同盟會。 1918年與朱蘊山、沈子修等創辦了第三甲種農校，並任學監。
劉希平 (1873-1924) 原名曉衡， 字蘭香	1907年赴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法律，1911年獲法學士學位回國。	在日本曾加入同盟會。 回國後積極參與一、二次革命運動。 1912年與朱蘊山、沈子修、宋竹蓀等密謀在安慶起義，事敗逃亡。
光昇 (1876-1963) 字明圃	清末秀才。 1905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	曾加入同盟會。 1910年畢業回國任教安徽法政專門學堂，積極參與一、二次革命活動。
沈子修 (1880-1955) 原名全懋	畢業於兩江師範學堂。	1907年加入同盟會，並在六安組織分支部，積極在各鄉鎮組自強學會，建立民團。 積極預備辛亥革命。 1916年與劉希平、朱蘊山、楊允中密謀在安慶起義。 1918年任教育會總幹事。
汪孟鄒 (1878-1953)	清末秀才。 曾就讀南京陸軍學堂。	1903年在蕪湖創辦了科學圖書社，該社由清末到五四，一直是革命活動的聚腳點。
朱蘊山 (1887-1981)	父親在當地頗有文望。十六歲前，在家習舊古文詞和經史。 1905年中案首秀才。 棄科舉後到六安廩陽書院就讀。 1906年考入徐錫麟所主持的安徽巡警學堂。	1906年加入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 1907年因與徐錫麟起義，與楊允中被押赴刑場陪斬。 1907年加入同盟會。 1908年曾與熊成基發動安慶起義。 辛亥革命時任青年軍隊長，其後全力推動反袁反軍閥的活動。
高語罕 (1888-1948)	父為有名漢學家，自少在父所辦私塾讀書。十七、八歲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學。	1907年與韓衍共事，1908年參與熊成基起義。 協助韓衍辦白話報。 武昌首義積極參與，組織青年軍。
盧仲農 (光法)	縣生員。 甲午後棄科舉業，先就讀於江南高等學堂，後改入江南陸師學堂。 1902年東渡日本，入宏文學院。	1903年與李光燭創辦旅湘蕪湖公學。 1904年與李光燭創辦安徽女學。 積極參與辛亥革命。

育過渡到新式教育的一代。

其次，這批皖省五四運動積極指導者，幾乎無一例外，包括在皖外的陳獨秀、高一涵、李辛白等，皆清末民初積極參與革命活動的黨人，其中不少更是皖省革命運動奠基者和組織者。曾早在五四時期之前，相互間已經是革命同志和文化教育革新運動的同伴。

安徽五四運動不僅在人事上與清末民初的革命運動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即使在五四運動中表現活躍的機構，也與清末民初的革命運動有一定的淵源。在學校來說，最活躍的蕪湖是省立五中和二農，安慶是法政專門學校。

五四運動中被稱為蕪湖的北大之省立五中，其前身是在清末建立的皖江中學，又是清末最具革命性質的學校之一。張通典（伯純）曾任監督，陳獨秀、章士釗、柏文蔚、蘇曼殊、盧仲農、江暉的一輩著名革命文人曾先後任教該校。他們的風流餘韻影響很深。由於這種歷史因素，還聘請了劉希平和高語罕擔任教師，胡適、孫毓筠等人也曾到該校演講過，給學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前身就是上面屢屢道及的在清末赫赫有名的蕪湖安徽公學，被視為是中江流域革命發源地。光復後的1912年7月，該校遂改名為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五四時期尚留在該校任教的盧仲農、王蕭山、陳唐卿、汪雨湖、王仁舉等人都是原辛亥革命運動的黨人，所以該校「革命氣氛濃厚」，學生所受的影響也很深。皖西五四運動的中心是六安第三甲種農業學校，該校則由盧仲農、桂月峰、劉希平、朱蘊山和高語罕等人所籌辦。學校而外，如汪孟鄒的「科學圖書社」等機構性質也相類似，限於篇幅，茲不贅述。



三 啓蒙者的角色

上面關於安徽五四運動指導力量性質的考察分析，主要集中於政治活動方面，僅就這方面尚不能概括二十世紀初形成而具有革命性質的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其實他們自登上了歷史舞台，除了參與推動革命等政治運動外，同時擔當了思想啟蒙和社會文教革新的先驅者的角色，這對促進當時社會的蛻變，起了不容忽略的作用。

安徽新教育開始的契機，雖較遲緩，但是基本與全國新教育的開展，步伐一致。首先，甲午的戰敗，激發了全國的奮發圖強。教育上遂有戊戌新政之廢科舉，興學堂的新措施，安徽1878年籌建的求是學堂是新學堂之始。其後新學堂的興辦雖因新政的失敗而遭挫折。不旋踵清廷頒布了「壬寅學制」(1902)和「癸卯學制」(1903)，詔令獎勵私人籌建學堂，皖省新學堂的興辦於焉勃興。從清末到民國初建的近十年，是安徽新教育的草創時期。這個時期興辦的各類學堂，包括：蒙養學堂、中小學堂以至專門學堂，其設備雖大都因陋就簡，各校學生也以數十人為多，但學堂興辦數目的增長，相當可觀，下表可見一斑。

二十世紀初形成而具有革命性質的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除了參與推動革命等政治運動外，同時擔當了思想啟蒙和社會文教革新的先驅者的角色，這對促進當時社會的蛻變，起了不容忽略的作用。

年 份	學堂數目
光緒二十八年(1903)	13所
光緒三十年(1904)	41所
光緒三十一年(1905)	80所
光緒三十二年(1906)	198所
光緒三十三年(1907)	293所
光緒三十四年(1908)	503所
宣統元年(1909)	723所

這七、八年發展起來的學堂，數目雖達七百餘所，其中佔90%以上屬於高等小學或以下的學堂。高等小學或以下的學堂背景資料難於考究，至於全皖中學堂或以上的學堂，根據現有資料，只有二十所，而且大都屬府、縣改原有舊書院而成^②。在這為數不多的中等以上新辦的學堂，由具有革命傾向的知識分子創辦或主持的為數不少。除上面提及的皖江中學堂(1903)和安徽公學(1903)不再贅述外，另有：懷寧中學堂(1904)鄧繩侯任監督，桐城學堂(1902)由李光燭和盧仲農協助創辦並主持；省立法政學堂(1906)由楊響龍創辦；高等巡警學堂(1907)創辦及主持人是徐錫麟；蕪湖女子公學(1906)，民國後改稱為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堂(1913)，由李光燭和阮強開辦，是為安徽女子師範學校之始。徽州官立新安中學(1906)監督是許承堯；懷寧尚志學堂，鄧繩侯曾掌校長職，葛溫仲實際主持校務，任教的大都是常恆芳等、湯葆明這些革命知識分子；法政專門學校則由光昇和劉希平創辦和主持。上述各學校在清末安徽來說，算得上較有規模和成效，到了民國，也成為重點學校^③。

除了中等或以上學堂外，小學學堂一類由傾向革命的知識分子創辦和支持的尚多。粗略舉例，孫毓筠創辦了壽州蒙養學堂，孫養灑、湯葆明等任教職。壽州另有芍西學堂，由李蘭齋主持，吳暘谷等任教。潘晉華獨資捐助創辦了桐城崇實學堂，教員有楊希説、史大化、葛溫仲、裴書田等人。胡渭清、吳性元、吳暘谷等在廢科舉前正在合肥辦義塾和藏書樓，到科舉廢止，他們再先後辦了城東和城西小學堂。1907年，吳暘谷等辦模範小學速成師範。懷遠的養正、萃華都屬清末革命知識分子創辦的學校。

這種新教育的興起之促成社會的變化，一身體驗了其中新舊教育的轉變的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的高一涵對此有所分析。他以為辛亥前後，是政治思想變化最複雜時期。那時有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對青年學生有一定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清廷廢科舉設學堂這一重大的改革。自廢科舉設學堂以後，他們都迫不及待地走出私塾，進入學堂，棄八股，廢策論而學西方科學，想從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找到富國強兵之道^②。

學校而外，報刊是晚清用以啟牖民智，宣傳新思想的最主要的工具。安徽之始有報刊，是因領導湖南自立軍起義失敗被捕而瘐死獄中的汪熔所辦的《白話報》(1899)。根據筆者現今所能找到資料，由清末到五四前，在安徽辦的報刊約有三十多份，其中清楚知道屬革命知識分子創辦和主持的，計有：《愛國新報》(1903)，由陳獨秀、潘晉華創辦於安慶；《安徽俗話報》(1904)，由陳獨秀主編，協助的是房秩五、吳守一等；《鳩江日報》(1905)，王鶴天辦，主持筆政的是齊月溪；《安徽白話報》(1908)由李辛白主編；《安徽通俗報》(1908)韓衍主編、高語罕、朱蘊山、孫養灑等編輯；《共和日報》(1912年)，由李辛白、吳伯嵐主筆政；《皖江的日報》(1910)初由陳子範做主筆，後由郝耕仁繼之；《安慶日報》(1911)，總編輯是夏印農，總輯是鮑際唐、焦龍元；《安徽船日報》(1912)，由韓衍所辦；《六安白話報》(1911)社長是張仲舒^③。這些報刊雖大都倏起倏落，未能持久，但在當時閉塞的安徽社會，其啟牖民智的先鋒作用，不能低估。就舉陳獨秀主編的《安徽俗話報》，該報兼備新聞報紙和雜誌的特點，內容有政治評論，也有社會新聞動態，還介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各方面的新知識、新思潮。內容豐富多彩，形式活潑生動。論者認為該報是十一年後出版的《新青年》的雛型，在許多方面它還是《新青年》的先聲^④。

除學校和報刊外，舉凡安徽清末民初的新興文教事業，如圖書館，如話劇團，如書局，幾乎一輩傾向革命的新式知識分子起了鋪路蓋樓之功，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表述。

高一涵以為辛亥前後，是政治思想變化最複雜時期。那時有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對青年學生有一定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清廷廢科舉設學堂這一重大的改革。

除學校和報刊外，舉凡安徽清末民初的新興文教事業，如圖書館，如話劇團，如書局，幾乎一輩傾向革命的新式知識分子起了鋪路蓋樓之功。

四 革命與啟蒙的結合

根據本文以上的研究，再結合筆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一文考察，雖然較集中於史實的疏解上，然而其中所顯露的事實，相信能對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提供了不少可重新思考和理解的地方。由於關涉到複雜的歷史問題

叢，這篇短文無法說得周延，所以問題不能一一展開，只就其中二點說明一下。

長期以來，學術界都視五四運動為一劃時代的歷史時期，過分忽略其與前此的辛亥革命運動的關連。有所論及，也只注意滿清帝制的推翻、民國的建立後的幾年政局和社會思想之對五四運動所發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去立說。

從各方面史料披露，五四運動尤其前期，與辛亥革命有着一般歷史前後階段所沒有的特殊的內在聯繫。兩個時期的特殊內在聯繩的密切程度，如不予以理會，只分別作獨立的歷史考察，會影響歷史理解的完整，過去的研究顯然有此傾向。史實昭示無論從人物譜系和文化思想的發展淵源，兩個運動實一脈相承。

從人物譜來說，以《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為中心結集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力量，原先固屬清末民初的革命力量的組成部分，不過北京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之與新文化倡導力量關係，至今仍不明朗。不過有迹象顯示，運動前後，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錢玄同、沈尹默、高一涵、王星拱等都參與進去。而在地方上，如安徽則清楚表明，運動與這股力量直接有關。可見五四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不能截然分開。這種情況，印證浙江等省，更清楚明朗。

研究也顯示，清末民初有着一代表革命思想組成部分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動，其聲光雖因辛亥革命運動特別在後期主導力量本身側重軍事和政治兩方面，加上基層史實挖掘不足，有所掩抑而不彰，但事實卻非過往想像的那末沉寂，更非部分學者仍在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維新派有着特殊緊密的聯繫」^②。

關於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的內在聯繩的線索，可以從第一代近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形成與歷史作用的考察入手。關於近代形態的知識分子的形成時間和世代的界定，衆說不一。筆者以為從經新舊教育正式轉變為界定的標準較合理^③。

筆者以為，從1900年到1920年，即由十九世紀過渡到二十世紀之間的二十年，是中國第一代近代形態知識分子的形成和成長期。該第一代近代形態知識分子的形成，其中具有革命傾向的一群，立刻躍登歷史的舞台，成為這二十年間最具活力、最前衛的革新力量，這二十年在歷史時期上說，正貫串了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運動和早期五四運動。辛亥革命運動和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首先以革命形態出現的歷史運動，而該兩個運動的主導和主體力量正是新興的而具有革命傾向的第一代近代形態知識分子^④。反之，五四時期年青一代與該運動指導力量實屬兩個世代，不能混淆「五四一代」這觀念。審視過去的百年，展望可見將來，知識分子在歷史舞台上能起如此主導和主體作用的，只能是1900年到1920年的二十年。

這裏還要指出的，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光芒，以及倡導者在思想和學術上的成就，容易使人錯置，他們都是「純粹的近代知識分子」，並謂「新文化運動的自我意識並非政治，而是文化」，而只承認「其中便明確包含着或暗中潛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而已^⑤。誠然，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一群，在第一代近代革命知識分子中較具強烈的文化意識，對教育和社會文化的革新，孜孜以求，特別重視。辛亥革命的挫折，更促使了這一輩人要從文化思想去作根本改造的

五四運動尤其前期，與辛亥革命有着一般歷史前後階段所沒有的特殊的內在聯繩。如分別作獨立的歷史考察，會影響歷史理解的完整。

五四時期年青一代與該運動指導力量實屬兩個世代，不能混淆「五四一代」這觀念。

取向。但他們大部分並非脫離現實政治活動的純粹學者和知識分子，而是革命知識分子。相對於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一輩革命家和政治家，他們更富於濃厚的學者形態，思想上更傾重於文化價值的取向。但是，除胡適個別人外，他們都是當時政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離開了他們這種實踐的政治活動的經歷，純然以思想家和學者去看待他們，也難得真相。他們與清末民初實際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革命者、啟蒙者的雙重身分也是他們的特點，自登上歷史舞台，他們自始則承擔着救亡和啟蒙的雙重重任，並非是作為啟蒙者去補辛亥革命的救亡者的不足，也非五四示威後由啟蒙者轉向救亡者。至於五四愛國運動之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和文化性質，都在此展示了出來。

順此理論，我們打破以往將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截然二分的歷史分期法，結合兩個運動，從較廣闊的歷史視野去審視這段歷史，將呈現一幅不同的面貌。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與清末民初實際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自始則承擔着救亡和啟蒙的雙重重任，並非是作為啟蒙者去補辛亥革命的救亡者的不足，也非五四示威後由啟蒙者轉向救亡者。

註釋

- ① 筆者撰有〈辛亥革命時期反傳統思想——兼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一文，載日本廣島大學史學會編《史學研究》第146號，1978年，乃首先試圖綜合兩運動在思想發展的淵源上作考察。另金沖及與胡繩武在《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則更系統地接觸到這個問題。
- ② 關於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兩者的關係，至今尚各有各說，少所共識。試舉幾位著名近代史學者在新近的論著中的說法以見一斑。丁守和認為「五四運動是反帝愛國的救亡運動，又是啟蒙開新的文化運動，啟蒙與救亡，互相促進和結合」（〈關於五四運動的幾個問題〉《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頁3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耿雲志則以為「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本不是一回事。」（〈中西結合，創造新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再認識〉，見前引《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頁91。）王爾敏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顧〉一文，在檢討到五四運動，筆墨主要集中於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關係的闡明上，他主張要分開「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又認為「救亡與啟蒙的攜進，屬於五四後的現象，而非五四本來面目。」（見《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頁2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再版。）
- ③ 李澤厚提出啟蒙與救亡兩個概念，去闡明近代史發展的特徵和進程（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年）。卻引起了相當大的反應，上述丁守和與王爾敏二文都涉及這問題。
- ④ 拙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見前引《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
- ⑤ 李則綱：〈安徽青年的覺醒與反軍閥鬥爭〉《安徽文史資料選輯（二）》，頁49。合肥：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2年。
- ⑥ 見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1919-192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 ⑦ 周新民：〈五四時期的安徽學生運動〉《五四運動回憶錄》（下），頁787，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1979年。
- ⑧ 同註⑤。另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安徽現代革命史資料長編》第一卷，

- 頁154，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雲鶴、翟宗文，李仲實：〈五四與安徽學生運動〉《五四運動回憶錄》（下），頁801、804及874。
- ⑨ 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頁30，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
- ⑩⑯ 王持華：〈蕪湖學生運動紀略〉《安徽文史資料選輯》（二），頁65、71。
- ⑪⑯ 朱蘊山：〈回憶五四運動前後在安徽的活動〉《安徽文史資料選輯》（二），頁5及前引文。
- ⑫⑭⑯ 吳騰鳳：《蔣光慈傳》，分別見頁14、18、12，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
- ⑬ 胡蘇明：〈五四時期蕪湖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安徽文史資料選輯（二）》。
- ⑮ 蕪湖市文化局編：《蕪湖古今》，頁36，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
- ⑯ 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安徽近現代史辭典》編委會編，《安徽近現代史辭典》，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勞章〈光明甫先生事略〉《安慶文史資料》總第十五號。朱光潛：〈李光燦先生傳〉《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二十七冊，中國文史出版社。
- ⑰ 高正芳：〈清末的安徽新教育〉（上、中、下），見《學風》第二卷合訂本。
- ⑱ 〈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四），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
- ⑲ 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後安徽青年學生思想轉變的概況〉《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431。
- ⑳ 同註⑯等，因所述乃湊集零散資料而成，此處不一一列出出處。
- ㉑ 沈寂：〈陳獨秀和安徽俗話報〉《歷史論集》（一），頁342，齊魯書社，1980年。
- ㉒ 王富仁：〈對全部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追求〉《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前引書，頁271。
- ㉓ 舉例來說，李澤厚認為「經由庚子之後大批留日學生的湧現，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知識層在開始向近代行進和轉化」，並稱之為「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210-211。）但在文內，李氏卻時而模糊的稱五四一代，辛亥革命一代的劃分。林毓生則以辛亥革命前後劃分，嚴復、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為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而以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胡適、魯迅稱為第二代。（《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頁46、59。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 ㉔ 首先以知識分子的角度去檢討辛亥革命的可參考王德昭：〈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卷第一期，1971年9月（香港）。Mary Backer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㉕ 〈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11。

陳萬雄 1948年8月出生。1973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1975年獲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碩士學位。1977到1980留學日本國立廣島大學，修畢博士課程，1989年獲香港大學博士學位。現任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主治中國近代思想史和近代中日關係史。專著有：《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